



大学者随笔书系



潘光旦

直道待人

Panguangdan Suibi

潘光旦随笔

潘光旦集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和翻译家于一身，在人文学科的沃土中耕耘。他用文学家的文采，写出了许多精辟深邃却读之轻松的小文章，独到的视角、睿智的文笔，处处闪烁着思想的亮点，让人不忍释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直道待人 潘光旦随笔/潘光旦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

(大学者随笔书系)

ISBN 978-7-301-18183-6

I. ①直… II. ①潘…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7319 号

书 名: 直道待人 潘光旦随笔

著作责任者: 潘光旦 著

策 划 组 稿: 王炜烨

责 任 编 辑: 王炜烨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18183-6/C · 0634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6 印张 202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有为有守

- 003 教授为学问之大敌说
- 006 科学研究与科学提倡
- 008 中国人与国故学
- 011 学问与潮流
- 013 观点
- 015 尚同与尚异
- 018 谈职业教育
- 021 假期与知识生活的解放
- 023 入学试验
- 025 “速成”
- 027 完人教育新说
- 030 中国今日之社会科学教育
- 036 “著作狂”及“发表欲”
- 038 教育与成见破除
- 040 父母教育的先决问题
- 042 躐等的中学与降格的大学
- 044 忘本的教育
- 048 漫谈拳术与体育

Contents

- 053 纪念孔子与做人
- 057 社会学者的点、线、面、体
- 061 读书的自由
- 066 说有为有守

社会人生

- 073 母亲节
- 075 全无心肝
- 077 出家与入家
- 079 孔老对峙的粤港
- 082 斯宾诺莎诞生三百年祭
- 084 耶诞时节的一些感想
- 087 中国历史的又一看法
- 090 “……说梦”
- 093 主义与幽默
- 097 甘地的成功
- 100 铁螺山房记
- 102 舞弊、抢险、拾荒、缝穷

105	说海塘
110	“小佛沿街卖”
112	两年前的今日
116	说“说人话”
118	疾病的社会性
121	相信预言者的忐忑
123	迷信者不迷
125	必也狂狷乎！
128	悠忽的罪过
134	一种精神两般适用
142	散漫、放纵与“自由”
146	类型与自由
152	正视科学
	——“五四”二十八周年作
156	南行记感
163	救救图书

Contents

蕪菴记游

- 169 武林游览与人文地理学
- 178 苏州之行
- 181 浙游三日记
- 185 杭徽公路道中(天目山通信)
- 188 杭徽公路道中(天目山通信之二)
- 192 杭徽公路道中(天目山通信之三)
- 197 杭徽公路道中(屯溪通信)
- 201 杭徽公路道中(屯溪通信之二)
- 205 豫晋行程的第一段(徐州通信)
- 208 陇海路上(自郑州寄)
 - 豫晋行程的第二段
- 212 黄河的沙及其他(太原通讯)
 - 豫晋行程的第三段
- 216 从太原到太谷(自太谷寄)
 - 豫晋行程的第四段
- 220 凤凰山镇压下的太谷(自太原寄)
 - 豫晋行程的第五段

-
- 224 从太谷回太原
——豫晋行程的第六段
- 228 明陵纪游
- 234 《鸡足朝山记》序
- 238 黔游一月记

有 为 有 守

>>> 潘 允 旦 直 道 待 人 >>> 直 道 待 人 >>> 直 道 待 人

教授为学问之大敌说

这是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家詹姆斯(Wm. James)与英国大致同派的哲学家歇雷(F. C. S. Schiller)谈话中间的一句。这句话究做何解,很耐人玩味。至少可以有三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是歇雷的,怕也就是詹姆斯的。下面就是歇雷的话。“一行学问的旨趣,在使学他的人天天加多,他的影响天天扩大出去。教这行学问的那位教授的旨趣,却未必在此,他要巩固他的地位,要增高他的权威。他的方法,便在使这行学问越变越专门。越专门,懂他的人便越少,有力量来批评他的人便越少;他就越觉得自己超凡入圣。……他的专门名词越来越多,弄得人人莫名其妙。……长此不改,不论那一行学问,必有教之不得学之不屑的一日。”所以说,一行学问的大敌,便是这行学问的教授。这是第一说。

孔子说:无意,无必,无固,无我。近世所谓科学精神也不外这四个大字。这可以说是学问家的四条清规,面子上,做学问的教授们似乎都很守清规的,事实上,一条不犯的,却寻不出几个来。大凡一个研究生,一个助教,总是小心翼翼的;到得后来,自己略微有些根柢,有些贡献,便要自称或加入某个派别。一有了派别,西人所谓 school,

于是入主出奴，是丹非素的精神，便一天发达似一天。他未尝不继续作研究功夫，然而他的立足点不免十分褊狭；这便是犯了固字与我字的毛病。要是他向来的方法是不大谨严的，到此也许更要犯意字必字两个毛病。

这许多毛病，在哲学家方面，真是不一而足；所谓系统的哲学家，我看无一幸免。科学家方面略微好些，然而数派或两派对峙的局势是常见的。极端的达尔文派与极端的拉马克派对峙；雷勃的机械派与杜里舒的生机派对峙；皮耳孙的统计遗传派与达文包的曼氏遗传派对峙；行为心理派与意识心理派对峙。诸如此类，在从事的几位教授，双方钩心斗角，容有相当兴趣，但在那一行学问方面，却多少不能不受打击。研究一行学问的教授，一有派别，这一行学问，在那位教授手里，至少已是宣告局部封锁了。教授是学问的敌人，这是第二说。

这两个说法，第一说似乎不适用于中国的教授；因为大多数的连一行学问的术语都记不清楚，遑论播弄他来吓人。第二说比较适用些。中国教授近来也有派别了。不过他们的派别，很少是自己的本领赚来的。那一派的有些名望的教授先有机会教他，他自以为拳拳服膺了，他便替那一派说话，替那一派辩护。这是很自然的，青年有志的学者，那有不愿意追随骥尾的呢？记得有一位老朋友，初入美国某大学，在某大教授下专攻某科；他的谈吐主张，不知不觉就入了他老师的派别，开口闭口的是“我师”“我师”。后来他毕业了，转入另一大学作研究生，我就再也不听见他提起他的老师，吐属也从此不同了。我看中国教授所自标或自期许的派别，多数是如此得来的。

然而中国教授所以为学问之大敌者却不在此。他们大多数除了介绍西方几本教科书以外，本来不做什么研究，在某行学问上不预备生什么净利。他们所以为学问之敌者，却在他们以教授自居，人家也口口声声的用教授两字捧他。

欧美各国大学的学生未必如何特色，收取学生的条件未必如何严密，然教授的资格却非同小可。在德国制度之下，从试教到正教授，中间要经过十数年或数十年的磨难和谨严的学者生活。美国的制度比较似

乎宽些,然而相当的年限也少不得。从助教,副教授,到正教授,决没有躐等的,更没有刚从大学或大学院出来一跃而为教授的。做别的事也许可以不讲资格和经验,学问是积铢累寸的东西,非讲不可。中国近来的大学,既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的教授当然比春笋更要多了。然而调查起大多数的履历起来,最了不得的是刚出大学院的哲博或法博(是 J. D., 不是 LL. D.)。我说此话,不是推崇学位,不过得过博士的教授,至少大概做过一篇多少自出心裁的论文,比较差强人意罢了。

一国各大学的教授,总看起来,是一个不组织的最高学府,所以当教授的责任与使命是非常重大的。如今中国的教授,十之七八,既无成绩在前,又不亟起直追于后,使当教授之名而无愧;结果,除了一行学问,在这位教授手里,不得不宣告停顿外,还有一个绝大的危机。就是,使登他“门墙”的人,并不见门墙如何之高,于是学问界幸进之人一天多似一天,吃教授饭的人一天多似一天;到得教授完全成了一种糊口的职业,中国的学问界就可以宣告破产了。除非有别派健全些的势力出来替他,这是不可幸免的。这不是危言,近来已很有这种趋势,前月工会组织发达的时候,不是有人提倡设立一个教授协会么?当时我顾名思名,以为与其沿用教授二字,遭非智识阶级的非难,不如称为“课业工会”,与其他工会一致行动,比较妥切些。这个工会的大目的,当然也在“保护并发展自身的利益”了。所以若有不做教授的人来谈学问,工会也许要出来干涉;不入工会的学问家,也许不准居教授之名,不许在大学里教书。此种现象,目下虽尚无有,不过若是不讲资格和职业化的两个倾向长此不改,早晚不免有这个日子罢了。

总之,就现在情形而论,中国多一个教授,那一行不幸的学问即多一个障碍,少一分进境:因为他把持了这一学问,一面自己不努力下去,一面使有志力者不能问津。教授——尤其是今日中国风行一时的教授——是学问的大敌,这是第三个说法。

(选自 1930 年 11 月《读书问题》)

科学研究与科学提倡

“科学研究”与“科学提倡”是完全两件事，但是我们中国人似乎分不十分清楚。这两件事是有先后的，提倡时期在前，实地研究时期在后，但是我们中国人讲究了二三十年的科学，到如今似乎还在第一时期之内，还是始终在那里提倡。

最近吴稚晖先生的全集出版了。翻看他的总目，第一集便是堂而皇之的“科学”；但是仔细看去，十多篇的文字里，一部分是有提倡性质的，其余连提倡的意味都不很明显，和实地研究更是不相干了。然而在我们中国人的眼光里，这都是科学文字，凡做科学文字的人，不妨奉以为圭臬。

大约三十年前，英国生物科学家《天演论》的著者赫胥黎让他的全集公布于世。这部全集实在有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赫氏的通俗论文，演讲的底稿，与在生物科学以外的研究录；合订成九大册，是 Appleton 公司出版的，总名为“赫氏论文集”。第二部分是赫氏生物科学研究的成绩，是赫氏一生用了积铢累寸的功夫得来的；每一篇有一篇的特殊贡献，在科学史上有永久的价值的；这一部分合订成四厚册，归 Macmillan 公司出版。如其把这两部分的内容比较一下，可知在第一部分里的文章，不论他包含多少科学材料，终究

只好放在第一部分里，在第二部分里是完全没有位置的。为什么？因为他只有提倡性质，而没有研究性质。

见了吴老先生全集的目录，因而联想到赫胥黎的全集，因而引起一番比较。这并不是对吴老先生，有甚批评；吴老先生虽很难说是一个科学家，但是他有他的学术上的贡献，我们不能小觑。不过编书的人把他一部分的文墨归并起来，贸然冠以科学二字，很足以表出我们中国人分不清楚科学研究和科学提倡的迷糊心理罢了。

中国的科学没有跳出提倡时期，并且没有把提倡和研究分清楚；还有一个很好的证据。这个证据可以在中国科学社的组织里见到。科学社里的领袖人物，都是有相当能力的，那决没有问题；但是中间有几位领袖，无论他学问如何淹博，能力如何广大，却似乎与科学二字不能发生多大关系，或者从前发生过关系，如今事过境迁，这种关系就很难维持了。欧美各国科学组织的领袖，十九是在科学研究上，不论那一方面，有过多量的成绩的。他们有了研究的成绩，出来发提倡的议论，自然不怕没有良好的影响。但是中国人的提倡科学，就是许多科学社里出来的人物，怕不免始终在那里隔着靴儿搔痒。隔靴搔痒式的科学提倡，如何可以使中国的科学事业脱离提倡时期而进入实地研究时期呢？

总之，科学原无须乎特别的提倡，至少，科学提倡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作业，也不是一张嘴，一支笔可以做得到的。给有志于研究的人一个生存的机会，把他们的成绩奖励起来，他们的人格推崇起来，这提倡的至意便寓于其间了。

（选自1930年11月《读书问题》）

中国人与国故学

照现在的趋势看去，中国人有一天太平了，想研究本国已往的文物起来，也许要到外国去才行。现在研究西洋文物，非到外国去不可；将来研究自己的文物，怕也非到外国去不可。现在的文化寄生生活，已经很可怜，将来的寄生生活，怕更要可怜咧！

这决不是耸动观听的危言。有两种强有力的证据。一是外国研究中国文物的人一天多似一天，而且研究的成绩一天精似一天；同时中国人自己做这种研究的人并不见得加多，并且精到的程度未见得能超过外国人，有时竟不如他们。二是中国的古物，比较值钱一些的，几十年来，不断的向外国输送，近来输出的数量和速率似乎更比以前要显著。古物一到了外国，外国人确能利用他们，用十分十二分的精神来阐明中国已往的典章文物。研究的东西既给他们搬运了去，老师的身份又让他们占了去；将来我们若完全不求振作，不想做考古的学问则已，否则怎样能不就教于外国的支那通先生们呢？

江南有句俗话，因人成事叫做“向人家手里讨针线”；现在国故学的趋势，似乎要向人家手里讨自己的针线了。这种向人讨自己针线的文化功夫，近来已经是数见不鲜。最近从德国译回来（“译回”

的名词是我杜撰的，不过怕以后很有希望可以通用！)的什么《左传真伪考》，便是一个好例证。从东瀛“译回”来的书本，何止数十百种，我们早就司空见惯了。

然而这还是请人家来迁就我；我们把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成绩译回到中国来，安知不是专供我们批评之用的呢！这也许是的。冠冕话尽可以怎样说，但是移樽就教的日子怕已经在目前了。前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化教授 Carter 死了，继任的是向负盛名的一位法国支那通 Pelliot(中文名字，好像叫做伯希和)；因为慕他的名，许多中国学生就选了他的课。他第一天上课，便突如其来的发了一篇《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全文，叫大家加以句读。这篇碑文里很有几个生字，并且是骈俪的体裁，竟把大部分的中国学生难倒了；他们很费了一些踌躇斟酌，才算交了卷。后来留学生们开会，特请 Pelliot 来演讲，主席某君致介绍辞，开口便说“中国文化是世界最古的文化，今天……”；Pelliot 上台，开口便把主席的话驳斥了一番。中国的文化是不是最古，暂且不问他，不过一把斧头决不能舞得如此容易，何况在“班门”之前呢？这位 Pelliot 不是别人，敦煌石室的藏经一大部分是他搬去的。

中国好比一个败落的世家，外国是几个暴发的富户。彼此毗邻而居，不上几年，世家的遗物不知不觉的都落到富户手里去了；富家子弟得到了这种遗物，也不免打动了研究的兴趣，结果反足以在世家的子弟前面，炫耀他的博学。这都是很自然的。不过，近来这个世家似乎有力图自拔，重振家声的欲望与决心。前有所谓国家主义，今有所谓民族主义，无非是这种欲望与决心的一个表现。但只有决心是不够的，同时要有具体的方法。

谁都知道这种方法之一，便是旧文物的保留和研究旧文物的提倡了。世家的家主要子弟们争气，第一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列祖列宗做过什么事业，有过什么贡献；祖宗的作为，子孙的无用，两相比较，一定可以引起子孙辈的自奋。否则日呼千百遍的“争气”，也是徒然的。

在民族主义或是国家主义的呼声中,我希望国人对于国粹之保存国故之研究,有一番新作为。庶几前途向人家手里讨自己针线的难堪勾当,也许可以幸免了。

(选自 1930 年 11 月《读书问题》)